

一九二九年回到了中國，李先生把歷史語言學的方法，適用到漢語；並且對中國少數民族無文字的語言，開拓描寫語言學的研究。對中國和泰國境內的傣語方言的比較研究，是他許多研究計畫之一。在他晚年，他對漢藏語的研究也作了重要的貢獻。

一九四六年重回美國，李先生在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任教，一九四九年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州立大學定居。一九六九年他接受了夏威夷大學之聘，直到他在一九七四年第二次退休為止。在一九八五年搬到加州的奧克蘭之前，他在火奴魯魯居住了十五年。他著作了九部書和幾十篇論文。

他除了在學術上的成就之外，他在中國毛筆畫和西方水彩畫方面也是一位多才的畫家。他中國笛子吹得特別好，喜歡唱崑曲，八七年七月六日，他在舊金山高興地觀賞上海崑劇團在美國首演。七月七日黎明，他忽患中風。八月二十一日，李先生在紅木城（Redwood City）凱沙醫院逝世。八月二十四日，他的家屬和好友在奧克蘭舉行告別式。

李先生身後遺有夫人徐櫻，他的三個兒女林德、培德、安德，和六個孫男女。

憶李方桂先生

周法高

我認識李方桂先生是在民國二十八年（1939）。那一年我從重慶的中央大學中文系畢業，考取了在昆明的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那時該所剛在昆明恢復，招收研究生。語言組的導師有羅莘田（常培）、李方桂、魏天行（建功）、丁梧梓（聲樹）諸位先生。魏先生不久就暫時離開了北大。語言組的同學有馬學良、劉念和跟我一共三個人。馬君的導師就是李先生，碩士論文研究的是昆明附近的僮語語法，劉君和我的導師是羅先生，研究的是漢語歷史音韻學方面。

那時大家都知道：李先生在美國是研究美洲印第安紅人語言的專家，民國十八年（1929）歸國後又從事傣語研究，並於民國二十六年（1937）以《龍州傣語》一書，榮獲中央研究院第一屆楊銓獎金。他在回國後又研究周秦古音，在民國二十年史語所集刊中發表了《切韻 a 的來源》一篇不朽的名著；以後又陸續發表了一些論文，修訂高本漢的上古音學說。此外，他在語法方面也有新的意見。他在西南聯大又發表了《漢藏語研究法》那篇開創性的講演。當時印刷困難，只由北大文科研究所用謄寫版油印了百來份。馬君的碩士論文，民國三十年（1941）在四川南溪縣李莊鎮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完成。（按該所因日本飛機對昆明轟炸頻仍，已於先一年由昆明龍頭村遷到李莊，李先生一家和馬君都入川。）由於李先生的指導，在語法方面使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四九年之後，馬君的碩士論文出版了，書名好像是《撒尼彝語語法》吧！馬君在序言中對李先生備致感謝之忱，可是後來的版本卻把這幾句話刪去了，大概也是為情勢所逼吧！李先生發表的語言調查報告很多，可是我還沒有見到專門講語法的著作，我想馬君這部論文李先生所花的心力可真不少，真是「能者無所不能」！以上這一段話，如果不寫出來，恐怕很少人知道。

我在民國三十年（1941）秋季從北大文科研究所畢業後，也到了李莊，和馬君劉君都任第二組的助理研究員。董同龢先生比我大學畢業早了三年，那時也是助理研究員。第二組還有李方桂、丁梧梓、楊時逢、張次瑤（琨）諸位先生。當時任副研究員的人很少，夏鼐先生從倫敦大學拿了考古學博士回來才任副研究員。過了一兩年，傅孟真（斯年）所長兼一組主任，要昇第一組的助理研究員張苑峯（政烜）先生為副研究員。張先生非常博雅，精研中國古代史，深通古文字之學，又長於目錄版本之學，在國學方面知道的很多（現在繼唐立庵（蘭）先生之後為大陸古文字學權威）。當時董同龢先生完成了他的成名作《上古音韻表稿》和論文《廣韻重紐試釋》，李方桂先生代趙元任先生為二組主任，很賞識他的才華，也提名他昇任二組副研究員。同時三組主任李濟之（濟）先生也提名高曉梅（去尋）先生為三組副研究員。傅所長不同意三個人同時昇副研究員，所長和主任連開了兩三天的會都僵持不下，結果還是所長讓步，史無前例地通過了三個人同時昇副研究員。從這個例子也可以看出方桂先生愛才若渴的心理了。

不久，李先生應燕京大學（當時校長是梅貽寶先生）之敦聘，向研究所請假，全家都搬到在成都的燕大任教了。民國三十四年（1945），我和董同龢先生到成都去調查四川方言，也常到李家去拜訪。那時我的《廣韻重紐的研究》和董先生的《廣韻重紐試釋》都發表於《六同別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三種，民國三十四年，四川南溪李莊）。李先生拿出他手抄的那保羅（Paul Nagel）的《根據陳澧切韻考對於切韻擬音的貢獻》一文，是從民國三十年（1941）出版的《通報》第三十六卷頁95-158抄出來的，原文是用德文寫的。那時我才在李莊同濟大學旁聽了一年德文，正好派上了用場，就在成都抄了一份副本，回到李莊後查字典研讀；後來寫成了《古音中的三等韻兼論古音的寫法》一文（《史語所集刊》第十九本，民國三十七年），介紹那保羅的說法。目前在臺灣也有引用那氏的說法的，就是根據這篇文章。飲水思源，都由於李先生因為戰時得書不易而把原文六十餘頁從頭抄到尾的緣故。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他不僅為後學付出相當大的辛勞了。

李先生全家離開成都赴美，我和董先生還趕得上在成都送行。民國三十八年（1949），我隨史語所遷臺後，李先生曾兩度返國任臺大講座。第一次大概是民國四十三年（1954），我曾經到臺大去聽他的普通語言學，另一課大概是語言調查的實習吧！中國學者對高山族語言作科學調查，大概是從他那一次回國講學開始的吧！民國

書和人

四十五年（1956），他發表了《邵語記略》一文（《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七期，頁23-51。據李壬癸先生於今年十月三日在臺北舉行的「李方桂先生追思會」上說「凡是研究山地語的，關於邵語方面，一定要看李先生這篇文章。」可見李先生做學問的一絲不苟了。至於第二次回國講學，那時李先生的權威著作《比較傣語手冊》（英文本，民國六十六年1977）業已出版，這也是講學時的一個課程。無奈我那時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無緣得飽耳福，以致今日對傣語一竅不通，真是可惜得很！

民國四十四年（1955）到四十六年（1957），我在美國東海岸麻州康橋哈佛燕京學社任訪問學人，那時李先生在西海岸西雅圖華盛頓州立大學遠東與斯拉夫語文系任教授，主持中國語文方面的課務。我在乘坐西北航空公司的飛機經過西雅圖時，也曾經拜謁過。

民國五十年（1961）八月底，我到夏威夷參加第十屆太平洋學會會議，九月二日宣讀了《中國語言發展中之分期問題》（英文稿）一文。那一次李先生也從華大參加。中華民國代表團的團長是李先聞先生，他也是李先生的老朋友。我們因為經費的關係，團員每人住宿費美金三元一天，往往兩三個人住一間房，李先生也和我們一樣住宿，絲毫沒有大教授的派頭，真是儉樸可風。想起那時夜涼如水在椰子樹下聚談情景，歷歷如在目前！



自右而左：周法高、趙元任（抱貓者）、張琨、李方桂、董同龢，
民國五十一年（1962）八月在美國西雅圖李先生家合照。

民國五十一年（1962）春天，李先生寫信給我，說是秋天要休假一學期，希望我用客座教授的名義替他代課。這當然是前輩提携後進、增加後進的閱歷和見聞的一種辦法，使我非常感激。恰巧同年八月底，第九屆國際語言學者會議在東部麻州康橋開會，趙元任先生夫婦、李方桂先生夫婦、董同龢先生和我都參加了。我的論文題目是《〈孟子〉書中的詞類問題》（*Word Classes in Classical Chinese*）。在兩位前輩的導引之下，我深深體會到他們造就人材、提携後進的苦心。在開完會後，我就飛回華盛頓州立大學開始代課。

華大的遠東研究，那時是相當聞名的。華大以「三F」而自豪，那就是：森林學、漁業、遠東研究。那時在英國人泰勒（George E. Taylor）系主任兼遠東與俄國研究所所長的領導下，大部分都是外國學者；中國學者有：李方桂、蕭公權、施友忠、嚴綺雲、張琨、勞延煊；德國學者有：衛德明（Helmut Wilhelm）、麥克爾（Franz Michael）；匈牙利學者有羅逸民（Irwin Reifler），俄國學者有蒙古語權威包勃（Nicholas N. Poppe），在遠東近代史研究和中國境內語言的研究是很有名的。我所教的課是「中國音韻學」和「中國古代語法」，並且蒙李先生允許我使用他的辦公室。我在那裏讀到許多前所未見的論文和書籍，真是使我大開眼界，深感李先生的厚意。

民國五十二年（1963）二月，我離開西雅圖，到東部康乃提克州新港的耶魯大學去教書，是二十多年前在西南聯大羅莘田先生音韻學班上認識的老友李田意先生邀我去的；因為他在民國五十二、三年間休假一年。民國五十三年（1964）夏天，我又接受香港中文大學之聘，任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講座教授。當時這個職位是公開登報徵求的，應徵的人很多，我的諮詢人是趙元任和李方桂兩位大師，這也許是我能夠中選的緣故吧！民國五十三年（1964）八月，我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那也是由於趙、李二位語言學大師愛護後進、給予强有力的支持的緣故，使我萬分感激。

民國五十九年（1970）八月二十五日，香港中文大學邀請李方桂先生在香港大會堂作學術講演，講題是「中國上古音聲母問題」，由我主持。我的介紹詞說：

「李先生早年是在芝加哥大學研究美洲印第安語，在語言學大師 Sapir 指導之下，得到語言學博士。後來回到中國，從事於非漢語的研究。所謂非漢語，就是中國境內漢語以外的許多語言。我們記得，在四十年前，即一九三零年左右，當趙元任先生到廣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時候，傅斯年所長曾經介紹趙元任先生是漢語語言學之父；現在我們在四十年後的今天，可以介紹李方桂先生是非漢語語言學之父。就是說在中國境內，漢語以外的各種語言的研究，李方桂先生是用現代語言學的方法來從事大規模研究的第一人。

「李先生在研究美洲印第安語方面，非常有貢獻，是全世界知名的，他的博士論文 *Mattole, an Athabaskan Language*，就是研究印第安語的。後來繼續發表很多論文，如：一九四六年在《美國土語的結構》（*Linguistic Structures of Native*

America) 這部書裏，李先生也寫了一章來討論美洲的一種印第安語言 Chipewyan。李先生還繼續寫他美洲印第安語研究論文。

「李先生學術研究的第二方面是傣語的研究。所謂傣語，是泰國和中國西南各省許多講傣語方言的民族的語言。現在李先生可以說是傣語比較研究的權威。他收集幾十種傣語方言，然後加以比較，擬構出它們的母語來。現在李先生的大作已經發表了幾十篇了，不過以後還要出一部大書，這是一部劃時代的著作。

「李先生不但對非漢語有研究，對漢語也有特殊的貢獻。早在一九三一至三五年，他就發表了他有名的講中國上古音的幾篇論文，和高本漢互相辯論。在當時，中國的學者用現代語言學的方法研究中國上古音的，可以說以李先生為第一人。李先生近來又繼續他的上古音研究，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和檀香山的夏威夷大學都曾經講過上古音；並且在臺灣大學也印發了上古音講義。這又是一個劃時代的貢獻，今天所講演的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李先生不但對這幾種語言有研究，對藏語也有特殊研究。特別對於唐代的唐蕃會盟碑裏的翻譯藏語和漢語的「對音」和其他方面，有一篇很長的論文在《通報》上發表。這又是一個很重要的貢獻。

「此外，李先生對臺灣高山族的語言又開了一個創始工作。過去日本人曾經研究過高山族語言，不過不是利用近代最新語言學的方法去調查的。而李先生可以說是用最新的語言學方法大規模調查臺灣高山族語言的第一位。現在在臺灣研究高山族語言的，大部分是李先生的學生。

「李先生不但在這五方面有特殊的研究，對於普通語言學理論也有研究。在一九六六年發表了《零聲母和零音節》(*The Zero Initial and the Zero Syllabic*) 一文，以及二十年前發表了一篇講藏漢語研究法的文字，後來又研究傣語裏面用詞彙區別各種傣語方言及劃分方言區域的辦法。這幾篇論文在普通語言學上也有貢獻。

「不但如此，李先生研究西藏語的時候，並且注意到西藏語的歷史。他寫過一篇《馬重英考》，就是考證在《唐書》裏面這個西藏土蕃大將在西藏人所寫的歷史裏面是怎樣的一個人。所以我們說李先生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在全世界上也是不可多見的廣博的語言學家。」

上面這篇介紹詞，登載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三卷第二期（一九七零年頁511-512），通常不易見到，因此轉載在這裏，也可以看出李先生治語言學精博的諸方面。不過李先生的治學功夫是永無止境的！他在民國六十年（1971）出版了《上古音研究》，民國六十五年（1976）出版了《赤坡巖語故事集》(*Chipewyan Texts*)，民國六十六年（1977）出版了《比較傣語手冊》(*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同年出版了《水話研究》，民國七十六年（1987）去世前一個月，還和柯慰南（South Coblin）合作出版《古代西藏碑文研究》，可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出版的《上古音研究》封面

見其孜孜不倦畢生從事研究的情形了。

關於「非漢語語言學之父」，還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夏威夷大學羅錦堂先生的夫人在《中央日報》副刊發表一篇文章，引用了我說「李先生是非漢語語言學之父」的話，卻被排字的人刪去一個「非」字；在臺北就有人去函更正。可是趙元任先生的夫人在美國看到了該文，就說周法高不該在趙先生退休之後連趙先生「漢語語言學之父」的稱號都轉送給李先生。余英時先生在香港向我轉告，我連忙寫信給趙先生夫婦加以解釋，並且附上介紹詞的複印本為證。

民國六十年（1971），美國語言學會的委員會中有一部分人要推選北京大學的王力先生為該會的榮譽會員。李先生也是委員會的一人，就提名我也做榮譽會員，結果兩個人都通過了。後來王力先生因為文革的關係，沒有能夠接受榮譽會員之聘；直到民國七十年（1981）左右，才由美國語言學會推選呂叔湘先生為榮譽會員。該會把李先生的推薦信複印了一份給我，大意說我除了對中國語言學有貢獻外，對中國古代文字也有研究。這當然是由於李先生提攜後進的熱忱，同時也表示他對中華民國和中央研究院的關懷，實在使我覺得萬分的惶恐和感激。

李先生自從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再到美國後，在東部的哈佛和耶魯大學教書。民國三十八年（1949）到西部華盛頓州立大學任教，直到民國五十八年（1969）從該校退休，轉到夏威夷大學任教。到民國六十三年（1974）從該校退休。大概在民國六十二三年左右，他到過香港。記得他對我說：本來夏威夷大學聘請時，說明任期是終身的；可是後來州政府通過了一條法律，說大學教授年滿七十歲一定要退休，所以從前的約定也不能履行了。

民國六十六年（1977）我從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後，由香港搬回臺北定居，專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研究員。李先生和夫人每隔一段時期也會來臺北。因為沒有甚麼特別可記的事，就只好從略了。不過其中有一件事是要大書特書：那就是民國六十九年（1980）八月十五日至十七日由中央研究院召開的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

書和人

早在民國六十七年（1978），就成立了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籌備會。那時錢思亮先生做中央研究院院長。當時大陸也在籌劃召開同類性質的國際會議，所以漢學會議的召開也具有一種和大陸對抗的性質，並且作為中華民國建國七十年之獻禮。會長當然是中央研究院院長，最重要的就是秘書長的人選。他必須是一位國際知名、德高望重的人文學者，和中央研究院有深厚的淵源，而且沒有濃厚的政治色彩。臺灣很缺少這一類學者，結果由院長敦聘李先生擔任。經過幾次謙辭之後，李先生也就毅然接下了這副重擔。人選發表之後，很得到國際上的好評和尊敬，因此參加的外國學者有不少第一流的漢學家。這次會議規模宏大，分為六組，同時開會，即：語言與文字，歷史與考古，民俗與文化，思想與哲學，文學，藝術史。宣讀論文二百八十篇，分訂九冊，外加總目錄一冊。李先生堅持一稿絕不能夠在兩處發表，縱使是黨國要人也不能例外。這種鐵面無私的作風也只有憑李先生的學術地位才能貫徹下去。結果會議開得非常圓滿，深獲國際漢學界的好評。到了民國七十五年（1986）十二月中央研究院召開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時，仍敦聘李先生為秘書長，他因年老謙辭不就，改聘為名譽秘書長，以借重他的大名。他屆時也出席了。

民國七十四年（1985）九月底，我應從中央研究院退休。七八月間，李方桂先生夫婦也在臺北，正值歷史語言研究所要開所務會議，李先生馬上就對丁邦新所長說他要提議聘任我為史語所的通訊研究員。我也深感他對我的關懷。

今年八月二十三日，我正好由臺中東海大學到了臺北的住宅，聽說李先生已於二十一日不幸去世。噩耗傳來，不禁使我感覺到在學術上失去了依傍。從此以後，也無從向他請益了。當時趕快向李夫人去信弔唁。

九月中旬，收到了李夫人印好的來函，反面還有英文寫的李先生的生平略傳〔見前〕。為了讓讀者明瞭李先生這一次生病的經過，特將該函轉引於下〔略〕，並且把英文略傳譯成中文，以資紀念。

民國七十六年十月十七日周法高

寫於東海大學學人宿舍